

XIANXIANG JINGYAN ZHELI · JINHE XIAOSHUOLUN

现象 · 经验 · 哲理 ·····



金河小说论

许振强 著 · 辽宁教育出版社

XIANXIANG JINGYAN ZHELI · JINHE XIAOSHUOLUN

目 录

理智的现象世界·····	(1)
经验与有效的选择·····	(17)
哲理：烛照现实·····	(32)
沉思：在当代社会生活矛盾中·····	(46)
社会心理向度·····	(60)
市民意识：题材、视角及其他·····	(71)
理解：达观的人生态度·····	(96)
幽默：语言和意义·····	(127)
回忆中观照：“重逢”的结构方式·····	(149)
欲在矩中：涓涓的情感活动·····	(167)
写实中的形而上思维·····	(192)
后记·····	(203)

理智的现象世界

如果把发表于1988年2月的短篇《借光》和写作于1979年2月的《重逢》排列在一起，就会发现，近10年过去了，金河小说还存在那么多相同的东西。不妨列出几条：1、都取材于敏感的社会生活矛盾；2、都对矛盾做了尽可能客观、专注、理智的描述；3、都有故事性强的特点，但都不提出简单的判断。这么说，可以展开好多话题，比如：金河创作视点统一性的问题，思想方法、艺术风格的衍化问题，直面生活的社会责任问题，等等。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尤其是经历了1985年以来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以技巧而不是以哲学思想为标志——金河还能条理有致地耕耘在自己初始播种的小说天地里，确实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在同一时间里，不少作家改弦易辙，尝试起带来激动的新奇方法，抑或频繁地完成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抑或自我品格不能确立的情况下迷

失了自己。这不仅在青年作家中，乃至在中年作家中也不乏例证。当然，文学是一条永远需要探索、创新的崎岖之路，如果真诚的话，探索的失误也可以铭刻出悲壮，文学史将铭记文学蜕变期的复杂现象。可是，金河小说展示的是另一种现象：独树一帜的品格未曾偏离。这种现象能够导致两种互悖的推论，或者，是一种惰性导致作家在既定品格中徘徊；或者，是起点较高，作家所采纳的思想方法、创作方法未能穷尽，并能潜移默化地使之完善和娴熟。自然。推论不等于判断，而有效的判断应尾随于具体的分析之后。

回溯金河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情况，人们愿意得出“社会问题小说”、“社会心理小说”的判断，早些时候，也有为之冠以“政治小说”的。金河小说注重展现生活问题、生活矛盾，并擅长涉足生活变更、时代变迁所派生的观念更替的敏感领域，所以留给人们上述印象式判断并不奇怪。他的发轫之作《重逢》，讲的是老干部朱春信和“打、砸、抢”分子叶辉同在文革中参加了武斗，但一个为审判人一个为阶下囚而“重逢”的故事；十年后的《借光》讲的是从小车司机到司机女朋友，到局长到交通民警都利用职权之便，互相“借光”的故事——以时代敏感的矛盾为载体的思维方法几乎贯穿了金河的全部创作。确实，金河对种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能够体现一定时期舆论热点的社会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并付诸这种观察以“内在的、理智的联结”（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第19页），在冷静、客观的故事中让读者去回味社会与人生。但是，这种理解方法一般还限于审视作家的取材方式，也就是说，读金河小说获得了“社会问题小说”、“社会心理小说”等等印象是对作品的题材概括。其实，金河喜欢选择有关敏感社会生活的题材，但不等同于中国古代轶事小说《世说新语》的传说，仅仅去完成一个个幽默、讽喻的故事，由幽默和讽喻来增殖文学的认识意义，也不等同于我国一些感性浓烈的当代作家，作家

主体情感旺盛，去派生明确的审真、审善、审美，或审假、审丑、审恶思想倾向。一般地说，金河小说的载体是敏感的生活矛盾，可是他并不付诸矛盾的怎样解决以期印证从认识论到反映论到审美观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纤毫差别。那样做，显然是“诗人气质”的呈现，即用善良的、纯真的理想和预言姿态去反观生活，取得有关道德人格领域的认识或审美的宣泄。金河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可能是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现象唤起了他创作的强烈欲望，他能用直觉的法则去记忆一些充满魅力的细节，不过当付诸创作构思时，他就陷入一种独特的思维程序：现象本身可以细部和直觉地存在，但对现象还原时，是“暂时中止判断”的，努力去排除主观情感的立场，取其较为纯粹的客观立场；排除他人创作和理论对类似现象的判断，专注于自己对对象本质的描绘和展示。这，在认识论上近乎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现象学理论，在创作实践上，则顽强地显示了金河的创作个性。显然，客观和理智的对现象处理的态度能够在文学观念的蜕变期保持一种创作心境的平衡，它由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衍化而来，却有意无意地揉合了现代的思想方法。由此也就能部分地解释了：金河正值中年创作旺盛期，在他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曾偏离自己的创作路数，不但创作效果异乎寻常的稳定，而且能不断引起文坛关注和首肯那种认为我国的文化传统是“文以载道”，现行文化政策鼓励文学直面现实，金河小说顺应其势而昭然的理解，似乎还少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所谓“写实”的作品，如同各种风格类型的作品一样，良莠优劣并存，不能一概而论。金河的小说确实以直面生活的外观坚定着我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审美观，但这仅仅表现了取材的习惯，在取材既定的情况下，对题材的看取和处理，则舍弃了既定和现成的法则。他每每睁开理智的双眼，去选择一个观察现象的独特视角，以造成新的审美可能和新的审美效果。金河内心蕴藏着强

烈的开创欲望，主要为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只是他执意直面生活敏感矛盾的选材，多少让人们忽略了他的创新实绩。事实上，他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就承受着中国稳态审美接受心理的排斥。如他的发轫之作《重逢》，因不吻合人们习惯的结论方式而受到非议。其实金河并不否定对“左”的路线的控诉，他只不过愿意置入小说一些当时看来是“禁区”，实际上体现生活原态的内容，这些内容导致人们结论的复杂化。生活的形态永远无法被再现，金河作的努力，是避开别人的角度、方法和约定俗成的认知尺度。尔后的小说依然如此，他没有走极端，以挑战者的姿态去反诘文坛上大量文学实践所获得的思想结晶，一味取相反的态度；他的小说或许能让读者读出那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却只能归咎于他自信的思想方法、思想过程和思想结果，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能力。这里应当说明金河搁置了别人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和判断，尤如我们熟悉的历史、道德、美学等等判断方式，不是说他在十年的创作中建立了一套个人的判断体系，他有了规定思想自身运动的特定方法，还不是。他的作品表明，他的判断不是先于作品，而是与作品俱生。也就是说，调动读者的智力从作品事物的运动中获取见仁见智的结论。这种“返回事物本身”的做法需要相当的意志和理智能力，它能够失去思想宣泄时的愉悦，然而，却能使作品——观察、选择中对所与事物的理智连结过程——获得较为持久的生命力，不致于时过境迁后因主观判断失准陷入羞于重提的尴尬。比如，他自《重逢》开始的新时期小说创作不写英雄、美的人物，也不把邪恶简单处理成极致，讴歌和鞭笞在他小说中体现为局部而不是整体；相反，现象的复杂抑制着他的情感、欲望、个人态度等等，催化着一种冷静的沉思，从沉思的立场去凸现价值、目的之类的东西。

客观和理智的立场是一种思想方法，不是不能明确地认识事物，而是把这种认识藏匿在个人的观察和客观的描述之中，

和王国维总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无我之境发生联系。我想，能够有效率地节制作者创作时主观情感的率直参与，是和金河的个人性格分不开的。一般地说，一个人的性格取决于遗传禀性基因、经历和学识的总和。金河从来沉思多于言语，愿意冷冷地打量、观察，他的个人经历，恰恰少于厄运而多于幸运，一次次命运的顺向大转圜使他成为他这个年龄段中的佼佼者，恐怕他少于恶魔的牵缠而多于自信的伸展，再之，他的理论兴趣很浓，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理性的法则培养了他的文化修养。因此，当他写小说时，不存在情感压抑而故作洒脱的心境，不需经过理智抵牾情感的痛苦过程，也不存在直捷的“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情感冲动。他愿意选择尖锐的社会生活矛盾，但是，由于少有个人的切肤之痛而能保持平和的姿态，他能够以健全的理性去展开一个没有被情感浸湿的现象世界。不妨说，这个世界的矛盾现象由于剔除了整体把握的感性机制于是和生活母体愈发接近了。作家性格和作品品格“不隔”，导致了金河小说的稳定存在；既敏感又冷静客观地描述所与对象，构成了金河小说的风格。进一步说，理性立场和理论修养给予金河智慧，为他的创作准备和创作过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因之，他的大部分小说是以复杂的因素调动了读者为之思考的欲望，他的“暂无判断”和读者的多重印象构成了审美的一种循环方式。

一方面，揭示现实的敏感矛盾，直面揭示不绕弯子，不隐讳，并津津有味地描绘构成矛盾的细屑现象，这是很能诱惑读者的；另一方面，又不付诸审美主体的情感色彩，不划分善恶美丑泾渭，不使用别人得出的结论，金河善于将逼真、细屑的现象、细节涂抹出复合色彩，人物形态由各种各样并非简单的因素，并非道德的善恶和历史的是非能单项解释的复合方面构成，这种将所与事物以理智连结的方法不啻能开展审美认识的

新途径。这里需要说明，专注于现象本身的复杂，描绘出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世界，对于擅长取材敏感社会矛盾的金河来说，未免不是明智的方法。它首先可以避免我国固有的社会政治关系所派生的许多麻烦，其中有些麻烦足以导致一个作家创作生命的萎顿；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和审美的方法能够开展比既定思维、既定印象更具有活力的现象世界。我们不难想象，在社会进程遽变的时代，呈示鲜活、逼真的现象比诉诸既定的或个人色彩的判断更有价值。就认识的环节来说，它显然能携带偶然性居多的内容，矫正人们惯性和惰性并存的共性认识，返回来重新打量现实，就审美的环节来说，它无疑能提供新的结构新的造型和新的范畴。

我不是说金河自新时期文学开始就把握了艺术创作的个人品格。他的创作基点是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无论作为反映方法还是作为创作方法在我国特定的文学阶段都留下了它的蹒跚之步。举例来说，现在被我们首肯的“伤痕文学”，就不乏概念化和公式化的胎迹。它打开了先前的种种创作禁区，扩展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广度，许多新颖的题材踏出文学荒芜中的空谷足音，然而多数作品是在既定的思想线索下完成的，又去证明一种既定的思想结论，只不过视角、题材、过程各异而已。金河无例外地从这条路走来，他自《重逢》始，像《抹掉名字的人》、《张堡两姑娘》、《杏花山下的孩子》、《在密密的森林里》、《哑巴》等小说都展示的是“四人帮”左的路线对人们身心的戕害，其思想线索和诸多“伤痕”作品殊途同归。他是以合唱队员的身份参与了当代文坛，他不可逃离中国当代特定的人文环境。有所不同的是，金河的个人经历使他少于控诉、宣泄等情感内容，他能够采取冷静和平和的态度，因之，即便在这些小说中，他必然有意无意地打上个人思想立场的烙印。比如，直至现在我们也难以将朱春信在文革中被动地参加武斗和他官复原职后审讯同参加武斗时的踌躇心理简单归类（《重

逢》），陈江在文革中受揪斗而隐匿山林，政策落实到他头上，他却决定返回山林孤岛，晒晾山货，为野花遮光，他的意志和行为不是能用左的路线摧残所全然解释的（《在密密的森林里》）。这些现象的披露，说明金河已经有意识在大合唱中突出自己的声音，他认识到既定思想线索的有效性，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必要，然而，他愿意，并欲望很强地去尝试需要别种解释的生活现象。金河的早期创作处于矛盾之中，外界的有形无形压力和个人突破模式的欲望形成矛盾。处理矛盾的努力，他放在了题材的选择方面，借助题材的警策性去替代自己的思想底蕴，伸张自己的意志，而不太自信自己的意志可以蕴含在有序排列的现象之中，客观态度的坚定，其实能呼唤和扶持作品的生命力。

1980年8月金河创作了《带血丝的眼睛》，以后又连续创作了《艰难的使命》、《诚实》、《不仅仅是留恋》、《燃烧的山林》、《打鱼的和钓鱼的》、《两套车》等小说。所列这些篇目，有个奇特的情况：要么在全国或地方获奖，要么被付诸争鸣，不免遭到强烈的否定意见。个中情况的有趣并不在于金河在文学作品中生发出振聋发聩的主张或异端邪说，而在于他的小说往往能有多种解释方法。他这时的小说仍以社会生活中的敏感矛盾为载体，但基本上不使用矛盾的缘起、高潮、解决的三段论方式。在矛盾缘起后的高潮中往往介入大量的复杂因素，因此不能得出一种矛盾一种解决方法的结论，而其中复杂因素的介入，这种矛盾的衬景、背景往往导致新的问题出现。这可以理解为一条矛盾线索导出深刻的多重背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矛盾本来就处于鳞次栉比的矛盾之中。生活不是线型、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取敏感矛盾作线索、作载体，又还原到立体的现象框架之中，自然就不可能对变化中的人，运动中的事物做斩钉截铁的主观判断。但文坛上奇怪的情况出现了，有些人宁可接受苍白的理想，却不愿直面原本滞重的现

实。当生活中不尽人意，或者说人们难以预测因而没有思想准备的矛盾生成时，他们还是痴情原有的思想方法，既定的一成不变的生活秩序，因此对描绘复杂现象的作品就不欣赏不容忍。《燃烧的山林》、《两套车》等作品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其实，《燃烧的山林》选取了生活中的不协和音：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春耕的速度加快了，但山林燃起大火时，即便县委书记去动员，人们也耽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愿去救火。小说铺排出农民们各式各样的理由和心理，将矛盾引伸开去。应该说，画孔雀的屁股是金河的思想方式，所以这样做，是文坛颂歌明明过多还要去唱，不消说是思维惯性和糊涂兼而有之，而所谓展示复杂的现象，其实可以从文坛既定思想线索的逆向起步。生活原本这样，人们的思想情况取决于变化了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那么，写出这些被人们忽视或不愿正视的现象，正是让人们更加清醒地反观生活，不致于盲目地顺应现成的理想结论。然而，尽管金河在篇末通过人物之思苦心孤诣地阐明主题：“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家庭承包责任制是错误的，责任制的落实不一定要导致山林起火和没有人愿意救火。”力图将他所描绘的触目惊心的现象做一种辩证的理解，这篇小说却受到了这样的批评：和农村的改革趋势不符，怀疑责任制实行后的大好形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之一，的确让人啼笑皆非。但同样的情况仍在发生，不久，《两套车》并没有使用明确的思想倾向只是描述现象，也被批评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由此可见，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坚持一种真正客观的反映方法该有多么困难。

有时，金河采取折衷或说狡黠的策略：为了暴露一些东西，而使用确定性的思想模式，阴暗面多了一点，继之曙光欲喷薄。典型的例子即是《带血丝的眼睛》。这篇小说触及了人们未敢触及的领域，表现老区的极度贫困和领导干部对之产生的凄楚、可怜、厌恶的阴暗心理，大量的生活现象和心理现象

很残酷，触目惊心，金河冷漠地把阴暗和丑恶、卑微尽情地展现着。然而后部笔锋一转，这一切又成为人们行动的动力，“世间的一切事都是可以挽回的”，“群山拥黛，苍山如海”，从领导干部到农民都决心改变老区面貌。我打量着小说前部后部畸重畸轻的比例，我体会着，在中国文学的特定发展阶段中，有些相当不错的思想方法也要故意走些弯路。

看来，金河执意敏感矛盾的取材方式，就他的思想方法来说，是应该便当却并不便当的路。为此他创作出像《少妇》、《老汉还乡》、《引力》等比较温和的小说来调节，或塑造一个文化低层次，但恰恰充满生命力的年青妻子，或农村老人到城里儿子家住，感到失去了自我价值、生命意义，或大学毕业生对教育工作高尚的一种重新认识等。在小说《引力》中，还尝试了平行蒙太奇的拼接方法。它们固然是金河对观察面的开拓，然而它们不能代表金河的创作风格。冷峻地看取人生，逆向地摄取奇崛犀利的矛盾现象，才为金河所擅长。这其中包括了一定要用最敏感最为人们关心的社会矛盾为载体，为线索，由此繁衍庞杂的世态人生；也包括了力图让矛盾归向多重的理解空间：人，善恶交织；故事，无所谓悲喜剧；形式，不趋向任何寓言化的结构。《打鱼的和钓鱼的》继《重逢》、《不仅仅是留恋》之后，再次成为金河创作的里程碑。所以说这篇小说具有相当的艺术高度，在于它大巧若拙，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一个似乎很平淡的故事——新任的副县长覃涤清假日到属下的水库游玩所经历的仿佛无碍大局的事情。然而，金河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里，他就是娓娓地叙述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用貌似正常现象的郑重呈现去回味反常。当一系列平淡的现象聚拢到一起时，它们给人的印象会无形中改变，这确是提示人们认识那些容易忽略或想认识却认识不充分的事物的好方法，而且还能给予历史的惯性认识以新的辨析机会。覃涤清到水库度假，水库干部群众前呼后拥，小说的要害在于他可以乘汽艇兴致地打鱼，但当

年和他一起参加水库会战的民工在一旁钓鱼，却要遭到呵斥和处罚，一个微妙的对比，由此开展了为尊者贵的社会舆论、社会心理氛围，开展了覃涤清颇不平静的心理世界。作家赋予覃涤清的反省是有意义的，在独善其身的设防中有着难以言传的忏悔和疑虑，于是，一种沿袭的历史滞重现象用鲜明的时代特征完成了新的本质内涵。它不同于“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喻，当历史讽喻和时代的现象碰撞时，覃涤清的身不由己显然只能诉诸新的解释。金河在把握这一点时，极其注意事物性质的不因循陈迹，而让事物性质在时代的运动中自我显示。

而后的创作，像《白色的诱惑》（1984）、《鹦鹉嘴有个天下乐》（1985）、《气与色》（1986）、《渔父》（1987）、《借光》（1988）等中短篇小说，我们看到的是上述印象的进一步加深，金河没有游离自己的创作品格。当然，他捕捉的现象更加开放化，既有政治领域的思考，也有经济、文化领域的思考。他还是把未被结论的大量生活现象进行心平气和的描述，但不期望送给读者一把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他把现象进行精心组合，这其中有时揉合作者经意或不经意的主观情绪，但主观情绪往往是针对个别细部而言，不针对整体。他貌似中肯地与读者对话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态度隐匿起来，他宁可让生活本身回答生活，生活的杂色就是杂色，不可能用一两种鲜明的色调取代。

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波及千家万户，触及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生活，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在蜕变着。反映到文学上，有的作品旗帜鲜明地站在历史运动的立场上，尽情地讴歌经济改革；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恰恰相反，它们愿意展现既有生活秩序的紊乱所造成的传统道德的沦失，尽管有的作品聪明地采取了哀哀唱挽歌的形式。这两种立场看起来都有合理之处，但无疑都和人们的主观臆念发生太多的联系。实际上，当主观臆念给人戴上有色眼镜时，总会改变生活原有的色泽。中国改革是巨大

的、急遽的，每时每刻都形成新的内容。短时间内，人们主观肯定的东西就会潜移默化被否定，而让人们否定的东西由于并非无生命力，它运动在一天早晨忽然又会得到人们的首肯。作为文学家，在本质上总结时代未免自作多情，它所应担负的，其实真正不应该是结论性的判断，由结论性判断所演绎的生活因果，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以形象艺术为标志的文学品格。概言之，一种主观的情感冲动有可能陷于欲逐潮反而被潮流所弃的困境和尴尬。在这里，金河机智地舍弃了人为的或说舆论的态度，他不在争先恐后的逐潮中力图先出一脚，不展现比任何人都高明的预言家姿态。精心地组合不仅是对立的因素而是立体的生活原貌是他努力的途径。农村教师方子贤和他妻子郭玉荣对生活抉择的何去何从，典型地表现了金河的理性头脑和智慧（《白色的诱惑》）。按理说，在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的选取教育与崛起的个体经济的矛盾是让人苦恼的事，中国的农村教育亟待发展，不好轻易否定，农村个体经济的兴起，更不好任意褒贬。1984年初，一般人写改革都一厢情愿地写改革与反改革之争，苦心表现改革者怎样以历史和人格的双重力量去披荆斩棘，保守者怎样有一副维护陈僵秩序面目可憎的嘴脸，再加上美丽的爱情纠葛。这个模式的结局，一般是改革初具成效而改革者受挫，因而期待进一步的改革。很明显，当这种思路成为模式时，它的受嘲弄以人工的装饰为原因，恰恰回避了生活现象的全部复杂性。金河从别人回避或不曾涉及到的入手，提供出与众不同却又恰恰需要考虑的生活现象。他写出了方子贤从事农村教育几十年，兢兢业业，月薪才五十七元，他妻子郭玉荣成了养鸡专业户的样板，收入是他的十倍，还被电台报纸所表彰倡导，无形中，在一个家庭里他们分别成了新旧经济产物的代表。然而小说开展的线索却很有意思，郭玉荣并没有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时尚优势来迫胁丈夫，反过来她对丈夫及丈夫从事的工作充满了爱与理解；方子贤面临鸡、蛋、

钱、荣誉的诱惑，曾经一度想停职或辞职，可是他一旦发现自己的职业正是那么神圣，他教的学生已成栋梁之材，他领导学生搞的病虫害测报可以使全县农民得到的经济利益不下二、三百万元，他又坚定了从事教育的决心，他认为“事业的价值不能用从事这个事业的人的工资来衡量。妻子养鸡致富光荣，自己教学拿五十七元工资也不必自惭形秽。”代表新旧经济产物、新旧价值观念的夫妻共存于变革时代的涡流之中。金河是绘制了一幅消泯矛盾的田园牧歌图画吗？不是。他体会到了时代内容的冲击力量，像商品经济对人的诱惑是极有魔力的，可是，当新旧经济，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时，并不一定要导致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结局。生活原本的面貌，不在于构思了多么巧妙的情节使作者的主观意志得到了贯彻，而在于它本身承受和消泯矛盾的能力。试想一下，假如金河设计了方子贤投诚妻子，或者郭玉荣的事业无限膨胀，那么，在今天知识贬值、价值倒挂的情势下将尝到一颗酸果。选取了棘手的矛盾，不顺应形势作简单化的处理，这是金河的智慧。当然，如同金河所有注重客观再现矛盾的小说一样，这篇小说也潜在着作者的主观倾向。或许，当他体察到中国“仁爱”、“使命感”等精神传统并不遏制改革的步履时，这种精神传统可能、并且实际在缓和、消泯与时代前进俱来的诸多矛盾，于是他完成了郭玉荣的形象。恰恰，郭玉荣形象有着历史与时代交融的复杂内涵，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人们的重新解释。

同样的，即使选择了较为尖锐的矛盾现象，能够在历史和道德二元对立矛盾中引发人们争议的现象，金河也不是蓄意将矛盾无节制地推向极致，导致非此即彼的结论，他依然采取平静而客观的表述方式，写出生活某阶段的主要矛盾，但主要矛盾蕴含着相互纠缠的各个方面。“天下乐”餐馆经理庞万高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体现了竞争、进步的时代内容，但他抛却了良知，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行为无疑能引起人们的道

德声讨（《鸚鵡嘴有个天下乐》）。这样的人物成为金河小说中心时，我们能看到历史前进必然携带“恶”的力量，是为对纯情理想形态的拒绝，时代本身的严峻赤裸裸地呈现着。世间越过伊甸园时代，要发展就要容忍与发展俱来的“恶”。然而，在小说后部，金河再一次冲决历史与道德矛盾的模式，“恶”中出现了“善”，庞万高收留了无钱投宿的姑娘，还无偿送给路费，他的内心深处泛出了“仁爱”光泽，尽管用表面的训诫包裹着，这就使庞万高又复杂了一层。这篇小说引来了不少评论，多数在辨析历史与二元矛盾的过程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换一个角度来看，金河回避了或时间或时俗的任何一种衷情和狂热，他不过描述了生活的可能与必然，他不使用进化论和决定论，小说的价值在于现象本身的再现，生活原型诱导了艺术的某些原型，于是一切可以多次辨析。

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特别是他最近的作品中，金河更注意人的精神形态，以及关联人的精神形态的文化形态。如《典型形象》（1984）、《饮马河上的发现》（1985）、《神童》（1986）、《猫眼儿》（1986）、《旺旺的自我发现》（1988）等。有时，他的构思方法也有所变化，比如，个体的揭示向群体的揭示衍化，有的小说的故事形态更接近散文状态。我想，这是作者在有意放松小说的因果链条，让生活组合的平淡和奇崛一起进入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饮马河上的发现》、《猫眼儿》等。它们从金河故事性强的结构中分离出来，散淡地绘制了一幅幅似乎是实录生活场景的图画。这种实录犹如照像一般，既摄出了生活的底色，又有取景的功能，在生活的底色中凸现一些有针对性的内容，有关社会心理的，有关人生哲理的，等等。而一切似乎是原态的现象。平淡中却饶有意味——因果链条的放松不等于失去了生活的秩序，它以生活秩序的可变形态提示读者的读解。以《饮马河上的发现》为例，写众人到饮马河边晨练，发现河中有莫名其妙的漂流物，由此产生各种猜测、联

想和议论。忽而认为是死婴，引发了有关道德的愤慨，每个人能依据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侃侃而论，忽而认为是女婴，转而又推论为私生子，于是各人对现实的感慨又随机转化。在无所事事产生的愤慨中，每个话题都能引起附和响应。即使到最后发现不过是块灰白的废塑料布，也能引起人们有关环境保护的怨言。一幅晨练画图，没有居中的人物和明确的矛盾因果，它的表象是人们无聊的牢骚，深一层，则由牢骚的个人背景中能窥出时代的情绪，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能折射出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氛围。照例，金河对此只是精心地加以整理而不置可否。当社会进入历史变动期，逼近生活母体的现象描述对生活返朴归真的态度或许更能凸现文学作用于生活的价值。因为，它对生活现象是无所谓舍弃的，于是往往不经意涂抹出的生活各个支点往往能抽象出历史步履的因子，现象可以多次阐释恰恰证明了自身的丰富，从而成为认识某一阶段生活，认识历史的有效手段。

最近看到了金河的短篇新作《黄桃》（载《东北作家》1988年2期）。我很庆幸这篇小说巩固了我认识的自信。我一点也不怀疑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欣赏和解释它，然而，我以为崔兴汉在软卧车厢里邂逅两位年迈的日本人所产生的全部复杂心理，显示着金河一以贯之愈见出色的现象披露。从崔兴汉开始对日本旅游者的冷淡，到因日本人并非傲慢而产生好感，接着因为看报载新闻，由日本商人对华的不友好而迁怒于观光客，再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情绪急转直下，继而又思忖对日本人应该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不料忽然听说眼前的日本游客曾是侵华军人，不过又听说他们做过战俘，饱受苏军虐待，心理刚有些平衡，又听到满耳皆是日本商品广告，又看到日本观光客因为有钱的必然习惯性自得态，崔兴汉的情绪可谓暴跳暴落。他始终保持着缄默、有礼，不一定友好，也不一定不友好。这一系列随感式的心理搏斗、浮沉现

象，揜阖刚烈的心理事实，伴随着崔兴汉所意识到的大量有关历史内容、现象以展示淋漓尽致——以崔兴汉用不用大连水果佳品黄桃款待同路人为微弱的线索。当然，最终崔兴汉也没让日本旅游客分享黄桃，不过，结合金河赋予崔兴汉大量的心理内容，是不是分享黄桃无足轻重。乍看，崔兴汉有着浓重的民族意识，可是他几次摠捺并检讨了自己的狭隘。剩下的，只是纷纭难辨的个人复杂情绪。如小说结尾：“旅程不长，但很累”，金河宁可用身心的疲倦去掩饰结论。原型描述不是更明智吗？

上述评述可以看出，我是以一种近似现象学的思想方法来评述金河小说的，是为对金河小说的一种认识。我以为，金河创作自新时期文学始就有意无意地去客观描述，客观再现现象，滥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无疑，我国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因此为金河小说冠以现实主义桂冠显得无的放矢。事实上，当金河有意以逆向的方式观察生活而避免使用别人的结论时，他有意回避自己的主观见解而把精力放在现象的描述时，我们就能发现已经迥异了所谓的现实主义规则。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不排除理想，古典的或现代的，这就使之呈现明显的主观色彩，而金河的小说，如前所说取缔了一切预言的姿态，只是诉诸大量现象、矛盾、问题，并很少给予明确的判断，理智、客观的视角成为他小说运动的方法。这时，现象的描述呈现的是生活本身真的美学价值，美学价值和所能具备的思想价值并存，而不仅仅是由漂亮或不漂亮的判断得出的程度不同的思想价值。

金河始终关注敏感的生活矛盾，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确定性的思想寻求。其实，倘若我们对他的小说做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他确实在孜孜寻求生活的意义，可是他愈来愈不对生活持简单的理解方法，他肯定认为生活的复杂是优于个人判断力的，而书本知识的领悟日多也渐而失去了神圣的崇拜色彩，